

空间研究视野中的朱莉娅·克里斯特瓦^{*}

王 慧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00134)

提 要:近 20 年来,空间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使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和地理学等人文学科之间呈现出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一转向又与“后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将追求差异作为空间政治斗争的目标。克里斯特瓦在后现代运动浪潮中成形的互文性理论、解析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也视多元差异为圭臬。她研究领域的宽泛性、理论内涵的丰富性,极易与新兴的空间研究结合生成跨学科新概念,赋予全球化时代跨学科文艺思潮以克里斯特瓦式的后现代理论色彩。

关键词:空间研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后现代主义;差异化;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168-7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38

The Studies of Julia Kristeva from the Space Research Perspective

Wang Hui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In recent twenty years, as an avant-garde turn in aspects of narratological theory, space research endows humanities, such as cultural studies, literary studies and geography, with interdisciplinary, transcultural research tendency. This turn, combined with postmodernism thoughts, pursues differences as the goal of the space political struggle. As same as above, Kristeva's intertextuality theory, semi-analysis and psycho-analysis theory reckon differences as the top priority. Her wide research interests, integrated with rich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tend to create a ser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s in combination with burgeoning space research.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se theoretical fruits will be inclined to give global interdisciplinary trends of literary thoughts a unique Kristevian postmodernistic color.

Key words: space research; Julia Kristeva; postmodernism; differences; interdiscipline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空间转向”作为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已成为后现代最活跃的显学。其主题在于追问、彰显空间的社会性及其对人、社会的价值。伴随后现代主义、空间研究兴起的克里斯特瓦的理论发展经历互文性、解析符号学和精神分析 3 个阶段。本文梳理克里斯特瓦的思想轨迹,在空间研究视野中观照其互文性理论、解析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与“空间研究”结合产生的“空间流动与前俄狄浦斯域”、“空间包容与女性特质”、“空间里的女性身体”等跨学科概念,为跨学科视野的克里斯特瓦研究提供新视角。

1 空间研究与后现代主义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然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的理论家都赋予时间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权,时间成为现代性的唯一标尺,但理论家的确关注过空间。古希腊哲学家探讨本体论问题,关于“空间是什么”的思考为当时的哲学家所重视。柏拉图预设“感觉世界”和“理式世界”,其思考中心是世界这个“容器”内的等级如何形成和谐整体。“虚空”和“处所”是当时讨论的主要空间概念,亚里

^{*} 本文系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对当代跨学科文艺思潮影响的研究”(TJWW15-02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帕特·巴克战争小说创伤叙事研究”(12BWW035)和天津市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当代美国奇卡纳文学研究”(20142226)的阶段成果。

士多德的“处所”定义是界面,包围物体,属于物体;在柏拉图“蒂迈欧篇”中,chora(容器)是“无形式的存在者”、“一切被创造事物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须处在某些处所,占据一个空间”(陈嘉映 2008: 1480)。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传统都把世界划分为“此岸”和“彼岸”,彼岸又有天堂和地狱之分。外部空间被概念化为由某种外在超验主人统治的神秘宇宙,时间是不朽和无限的。

“人取代神”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引发的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主旨。西方现代传统强调人类在时间维度上的进步问题。近代空间观由笛卡尔、牛顿等人确立,有下列两个特点:(1)空间只能充当永恒的、静止的背景;(2)受认识论哲学的影响,空间成为与人的主体性相分离的客体,且越来越“抽象化、同质化、简约化、平面化、空洞化”(Casey 1997: 77)。在近代空间研究的两种模式中,以人的知觉、认知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的相对多元的空间观地位不高,居于其上的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绝对同一的空间观。然而,后者根本无力阐释当代社会中人们全新的空间感知。由此,西方古代和近代两种空间观都沦为控制人的力量,而空间都被时间支配,差异在于——古代将“上帝”界定为支配空间的绝对权威,而近代则以人为唯一准绳。

19世纪“沉湎于历史”的历史决定论达到顶峰,在20世纪逐渐走向终结。20世纪,空间和时间成为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物理学的重要概念。上半叶的哲学重时间,柏格森认为时间是精神性的、连续性的和真实的,意指自由、意识和绵延,超越肉体 and 物质;空间是物质性的、分离性的、非实在的,意味着物质和肉体限制自由。因此,意识优于身体,时间优于空间。(罗素 1997: 350) 60、70年代出现的“空间转向”批判“历史决定论”和“线性时间观”,空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静止的容器,传统静态的空间开始言说,成为新的意义载体。1974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出版,将空间分析与符号学、身体理论以及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开启空间转向,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社会。传统观念认为“空间”是“一个等待着填充内容的事物或身体”。列斐伏尔坚决反对并强调空间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冲突的过程,是各种力量对抗的场所。他明确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意识形态性的”(亨利·列斐伏尔 2008: 46-47)。他还提出3度空间模式的空间理论解释空间的社会生产性,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空间时间”、“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的三元组合辩证构成(Lefebvre 1991: 85)。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认为,现代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包亚明 2001: 18)。现代空间更应是通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并不断形成的关系空间,

必然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相较于过去的君主统治依靠惩罚来维持,现代社会空间成为权力运作场所,权力通过有组织的空间活动而展开,人的社会化是身体服从于外在权力的规训过程。福柯的空间由多元的、异质的关系构成,后现代主义特征更为彰显。

传统空间观被打破,空间不再是实在的物理空间。大量的空间复制、戏仿等技巧展现出的空间充满异质特征的空间碎片。文学空间与生活空间没有距离,呈现出丧失“深度模式”的后现代空间地带。后现代思潮的核心是解构主义,客观世界解体为一系列碎片,后现代空间界限消弭、次序错乱。后现代社会对空间做出新的调整:后现代性以时间压缩、空间分散为标志,导致由时空压缩引起空间“地球村化”现象,表现为“不确定性、无中心性、变异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等特征”(Stengel 1985: 10)。资本主义不断扩张以人性而又隐蔽的方式,意识形态地控制人类的日常生活空间,西方社会思潮的整个“空间转向”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认知方法论:列斐伏尔设想一种多元并存的“差异性空间”——强化差异,从资本主义同质化的抽象空间中剥离,恢复重建自然天成的世界。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当代文化领域的空间化转向产生的温床,后现代主义空间化指西方当代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化,也是知识分子以空间方式介入社会、倡导差异和多元、关注人类生存价值的诉求。

2 空间研究与互文性理论

索绪尔建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符号学研究的主流。从196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克里斯特瓦提出的互文性理论批评结构主义只关注同质、静态的语言结构,仅以结构为对象的符号学无法解释符号意义的特征。她融合东欧学术传统和法国新思潮,运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把符号学的指意过程当成商品的生产过程,作为商品的符号的意义是主体对物质资料即先前文本加工而成。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主张一切现象和意义产生于主体间的对话。克里斯特瓦从文本视角以“互文性”概念替代巴赫金的“互主体性”概念,将意义的生成机制归因于不同文本在当下文本空间中的相互转换和吸收。她还受到巴特关于指意系统多层化研究消除稳定的终极意义这一观点的强烈影响,撰写“建立复量符号学”。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使能指在不同的时空、文本中使用,造成意义在文本间流转生成,呈现出流动多元性特征。这些新观点启迪克里斯特瓦提出以“不确定编码”为核心的诗性语言理论,加入被索绪尔忽视的时间因素和主体因素,建构以开放、多元和动态为特征的诗歌语言,开创以互文性和意义转换论为特色的符号学理论。

克里斯特瓦并不否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只不过将对上述两

个问题的理解转化成对“文本性”的理解,恢复语言和文学的生命力。她说,“文本就是‘生产性’,这意味着:首先,文本同其所处的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破坏-建设性的)再分配关系,因此,最好通过逻辑范畴而不是语言学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其次,它是文本之间的置换,是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在具体的文本空间中,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彼此交汇、互相消解”(Kristeva 1980: 36)。我们正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社会,在空间转向语境下,文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批评策略等方面,都要在多元性、异质性与互文性空间中相互运作。文学空间越来越参与到其他空间的生产,“任何文本都是一种由各种引文拼贴镶嵌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转换和吸收”(Stengel 1985: 66)。文学文本作为再现空间的生产,任何包括文学空间和非文学空间的文本叙述都在空间的反思中形成一张观念之间的“互文”之网。文学与空间的关系不再是前者表现后者,文本必然投身于多元异质的空间之中。文学书写对空间的关注打破流畅的叙事模式,取代它的是断片式、分层的叙事模式,即空间文学书写模式。由此,文学文本生产空间的多元性、异质性使文学生产成为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当代西方空间理论颠覆空间的依附性、同质性,突出空间的主体性、异质性。空间由于深嵌于社会关系领域而被政治化,由此生产出不同的等级性空间。“因为空间是政治的而有了空间政治学……空间不仅是发生冲突的地方,而且是斗争的目标本身。空间是一种政治和政治的生产。”(Elden 2004: 181) 空间的政治生产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重组。所以,空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异质性场域。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社会充满矛盾:现代性对人的侵害表现为人性的空间让位于资本的空间;现代性对人生活方式的侵害表现为生活变得具有同一性、缺乏差异性。他认为人们应按自己的方式进行日常生活,改变“麦当劳化”的同质化现状。此外,他还接受巴特的“快乐的文本”观点,认为这种由符号本身带来的自由含混、乌托邦和游戏特质,“经过修正后同样适用于各种空间及其肌理”(Lefebvre 2014: 120)。空间可以像文本一样摆脱原有的意义结构,成为潜在的极乐空间,他吸收符号学养分,将城市、建筑看成具有开放意义的空间符码,类似于巴赫金消除阶级秩序的狂欢化广场。我们现在身处的互联网空间以瞬息万变、多元互动为特征,网络的无限开放性让网站、博客内容时时更新,多媒体功能和超链接结构把传统艺术形式转化为新的艺术类型,都凸显出后现代媒介的流动多元性。可见,空间理论像互文性理论一样,相比结构理论有更大的开放性、容纳性;与此同时,互文性理论也突破时间性的历时研究,进入空间性的共时研究。

3 空间研究与解析符号学

20世纪70年代,克里斯特瓦立足于当代法国哲学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以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改造互文性理论,这种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研究的结合体是解析符号学(semi-analysis)。当代法国哲学家颠覆传统的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思辨主体为代表的主体观,由此奠定的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全新主体观是符号成义过程中异质因素相互作用的前提。在法国当代哲学观的启示下,克里斯特瓦提出多元、混乱的异质性主体概念既包含理性主体又包含非理性主体。

克里斯特瓦继承弗洛伊德与拉康的主体理论,并有所发展。她说,“我们的符号观将与弗洛伊德无意识观考虑进去的主体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Kristeva 1984a: 30)。弗洛伊德提出的隐藏于理性主体背后的无意识活动时常扰乱主体正常的理性思索。解析符号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认为语言具有动态性和物质性,将研究中心置于结构之外的内容——在结构生成与变化、在结构与外部关系中辩证地把握符号。符号实质上是主体的意识,克里斯特瓦论述的主体不是“原子”式的个体,而是处在与他者参照关系下的动态自我——一个自我与他人、他人与社会历史、自我意识与语言系统之间关系的动力模型。解析符号学不再是静态的意义系统,而是动态的意指系统。克里斯特瓦这样定义“意指实践”:“我把它称为符号体系的建立和抵消。抵消符号体系是通过使主体经历烦乱、狐疑的过程而实现的。这间接地挑战先前已经获得认同的社会结构,因此,社会中同时发生多次断裂、复兴或革命”(Kristeva 1980: 18)。也即,符号分析是符号消散的过程,符号学是语言学的解体过程。解析符号学开放文本隐含的无限可能性。克里斯特瓦关注语言性质的说话主体,并论述表意手段的发展变化性,用以突出文本意义生成中的生命活力。“说话”不是对他人言说,而是主体自我意识的更新。正是这些不断出现的逾越性现象才使一个具体的言说主体的生成、出现变得真实,主体成为一个未定的“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文本不再是主体通过语言结构表现创作意图,而是通过文本实践颠覆语言结构,释放“异质性”动力,否定统一主体。言说主体包含差异性和异质性,所以,符号的本性包含其对系统符码的侵略性。

在符号层面,解析符号学的异质性特征体现为对“符号”与“象征”的划分。克里斯特瓦用这两个概念描绘“意指过程”的两种意指模式:“符号”源于无意识,表达主体身份的冲动和能量;而“象征”依靠语法和句法来实现,它是人们用稳定的语言符号系统表达意识的方式(Kristeva 1984b: 27)。在潜意识尚未定型的阶段,人的生理、心理冲动有节奏地交替穿越,对这些冲动的“最初的组织形式是节奏、语调和原初过程(置换、口误、压缩)”(Kristeva

1988a: 239)。作为语言的物质层面,“符号”包括语言的节奏、韵律,具有非逻辑特性,它否定“象征”表达的语言的指涉与交际层面、单一的意义。类似于活跃着本能冲动的“场”,“符号”等待话语规约将它们整合起来,是意义生成的基础,意义的生成是“符号”向“象征”转化的过程。

在文本层面,异质性体现为“生成文本”和“现象文本”的区分,克里斯特瓦用这种概念分别对应“符号”和“象征”。作为文本表层,“现象文本”是日常所见的有形文本,体现言语主体的有限性。“它遵循交际法则,并预设一个言说的主体和符号的接受者”,是可感知的、可用结构描述的符号意指系统(Kristeva 1988b: 87)。“生成文本”源于文本深层的无意识,通过节奏、语调等叙述方式体现。作为生成过程的文本,它是“冲动能量构成的空间,是在生物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局限下通过生成机制和符号标志形成主体的空间”(同上: 86)。“生成文本”是非系统的本能冲动的释放,这种蕴含在语言中的潜在驱力,扰乱、分裂着现象文本。文本问题就是主体问题,主体的最终构成也是生成文本作用不断延搁的结果,这种无限开放性将文本写作视为一种类似于颠覆等级的快感体现,也是克里斯特瓦后来走向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理论萌芽。

叙事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权力斗争无所不在。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政治、经济的各种关系,空间的文化意涵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具体的空间形态与特定符号、意义相对应,是凭借主观“阅读”的“文本”。作为人的实践产物的“空间”,首要的表现形式是物质环境;其次是以符号体系为表征的空间秩序,社会强势阶层利用其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当代社会的权力是通过身体传输的符号权力,分散地隐含在日常生活中。一切权力通过符号发挥效力,成为身体无意识的符号。符号权力跨越社会全部关系的统治力量,人在这个由资本铸就的欲望之网中难以自拔。因此,现代空间应该是通过类似于“符号”、“象征”或“生成文本”、“现象文本”相互作用而处于不断形成中的关系性空间。列斐伏尔承认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是一种“中心-边缘”的矛盾,他以马克思辩证法为纲,建构的“历史-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超越“二元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理论统一性”(亨利·列斐伏尔 2008: 10)。20世纪后半期,政治、经济、信息技术发展促成全球化空间的出现,这意味着同质化对异质性的压抑,这种破坏性特征导致空间生产的“碎片化”现象,资本主义空间因此是割裂的、局部性的。在其中,模拟的环境变得比真实环境还要真实。詹姆逊由此认为,后现代空间作为空间的模拟,犹如“失却中心的迷宫”,令人体无法在空间布局中为自身定位,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周围的一切,从而引起人的空间迷失感(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2003: 497)。能够在无中心的后现代空

间内无限游弋的“符号”、“生成文本”,都具有异质性的边缘性特质,暗合后现代空间的碎片性、分离性特征;而与“符号”同质的“生成文本”在进入空间研究的同时,也把空间当作各种符号、文本博弈的场所。

4 空间研究与精神分析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克里斯特瓦不再局限于将哲学、心理学理论应用于解析符号学研究,而是以精神分析为核心,向精神分析本体、母性-女性问题、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她的精神分析研究用符号成义的观点研究婴儿从母体中脱离发展成独立主体的过程,以及母性在此过程中被卑贱化、被弃却的经历。克里斯特瓦从母性和爱的角度,得出与弗洛伊德仅关注父亲角色的精神分析截然不同的结论。

克里斯特瓦把文本看成主体欲驱和话语规约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更关注前者对后者的颠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主体是言说的产物,克氏的言说是主体身体和意识的共同产物,更加强调身体机制破坏话语规则的功能。为了复兴身体的“革命性”,她从“符号”的概念入手,让主体进入社会政治,生产诗性语言从而重写身体和意识的关系,构建深奥精细的前俄狄浦斯的母-子关系。与从“符号”向“象征”的发展相对应的是从前俄狄浦斯阶段向俄狄浦斯阶段的转变。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不是一个真实的母亲形象,而只以母性空间形式存在。母性空间是逻各斯即象征话语的断层,它不可言说并动摇着意义的秩序,作为表达主体形成的场域,充满律动与愉悦,也有暧昧与背叛,是符号活动和欲驱运作的空间。动态而无形的符号尚未脱离身体而形成断裂,与欲驱密切相关,是被压抑的语言维度。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前,在孩子的眼中,世界展示为母子融合的一体。此时,儿童在镜中看到的只是一个镜像而非能指和所指,它能够替代一切。一旦母亲向孩子展示自己的欲望还指向父亲,这种丰足就被破坏。在此阶段,人开始确定其主体身份并确立主客体之分。婴儿体验到由丧失母亲的欲望而产生的“虚空”感,开始认同母亲欲望的对象——父亲。经过母子间反复的融合和弃却,母亲离孩子渐行渐远,母子距离间隔拉大,直到孩子认同父亲的形象,同化入自身并成为他的形象。在儿童因恐惧阉割而与母体分离的镜像阶段,符号变得秩序化。克里斯特瓦坚持符号原本是母性身体在语言里的展现。进入象征阶段之后,主体受到的压抑表现为意义的差异、矛盾与分裂,其欲望从对母体的认同即对符号的认同转移到对象征系统的认同。“认同”不是“对符号之否定之否定的否定,它是对象征与符号间矛盾的反向激活。这一激活并非对矛盾的否定,而是指向异质性和它们两者的矛盾”(张岩冰 1999: 138-139)。主体的自我构形在这种认同中建立:它既认同父亲,又认同母

性身体。母性身体既是干扰性符号的源泉,也是建构性象征的前提。因为它与欲驱有着密切的前象征的联系,母性身体构成象征和符号、同一性和异质性之间的交叠。

女性身体被要求承担母性,克里斯特瓦也将女性特质解释为对母性的欲望,作为其自我的本质以及欲望的法律。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空间理论作为观察视角,聚焦于男女二元对立形成的性别歧视。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性别政治与空间生产关系密切,追求属于自己的位置空间体现着女性在“空间”方面的诉求。“19世纪以后的空间图式的核心在于:位置只有在同别的位置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恰当定位。”(汪民安 2006: 102)因此,与男性关系的状况,决定女性的空间状况。作为权力运作场域,生成物的空间已成为性别表达的新途径——空间设置怎样表达性别观念?性别空间的区隔隐藏怎样的权力规则?空间与性别隐含何种解放的可能?正如后现代理论重视边缘与中心,现代空间具有层级性:一为与消费、情感等联系在一起的家庭式、邻里式的女性边缘性空间,例如,直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最后一代女作家都习惯以封闭的文学表达描绘女性的生存空间,隐藏的阁楼、地窖都是“竭力寻找离开严酷现实和邪恶的男性世界的避难所”(拉曼·塞尔登 2003: 552)。二为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工商业、经济型的男性中心性空间。女性只有被定位为消费者才能短暂地被纳入男性空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在”确立为男性主体的存在,女性主体作为男性主体的生产物而存在,而“思”也应是男性化的。现代空间导致的权力结构将女性的客体化推到极端,女性时刻处于被窥视的境遇,直到其自身也在潜意识中丧失对压制的反抗。

严格的公/私领域二分法历来是女性主义政治批判的重心,因为这种区隔与压迫女性的言论相关联(Young 1990: 118)。女性空间“将知识/非知识,或可再现/不可再现,编码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做法,跟时间与空间的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包亚明 2001: 15)。女性主义认为建立在交往行动理论上的公共领域模式缺乏社会性别倾向,没有考虑非竞争性的女性私人领域。因为社会结构的男权制特征,女性的生活主要和柴米油盐这类非结构性生活有关,不具有“社会价值”,但具有贴近生活和关注细节的特点。时间造成女性空间的现状,在时间的持续变动中,女性存在本质也随之演变。清算时间,即打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传递关系,女性存在的流变使得女性空间位置不断变化,在空间内形成新的排列位置关系,目的在于开掘女性个体经验、特别是女性躯体和欲望。女性和空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早在19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女性主义关注空间的开山之作,认为女人只有在自己的屋子里才能

走出性别身份,进入短暂的想象空间。空间被编码为女性气质。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提出“尽管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经济、性别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压力,但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一种可以使女性获得解放和抵抗的空间。这种空间存在于男性霸权和官僚系统之外。在这里,女性可以通过幻想和主体性的张扬,来外化或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压力”(包亚明 2008: 170)。女性主义主体力求建构一种想象空间,避开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男权主义主体,这种想象空间是具有反抗意义的场所。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空间批评将视野从物质空间拓展到想象空间,关注处在两者间的第三空间的差异性。“第三空间”的概念建构出更具包容性的新空间,永远向新的可能性开放。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混杂空间,它使意义的结构成为矛盾的混杂性过程,从而避开二元思维的陷阱。因为二元思维把空间的复杂性简单化为某种固定的形式,凝固了人们生活的动态丰富性。第三空间是一个既边缘又中心的空间,一个含混不清的混杂地带,第三空间理论应用于性别批评和身份政治的再审视,使女性主义者能够通过建构“女性自我空间”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克里斯特瓦摧毁女性的本质主义概念,主张人的性心理差异未必等同于人的生理差异,如男性心理之中可能存在女性特质,反之亦然。所以,须坚持女性特质遵循生理-心理内部的多元逻辑,它释放被文化压抑的母性因素,挑战代表“象征”的俄狄浦斯结构。女性主体的重要性源自于其独特的生理功能,伴随女性生理痛苦经验的是巨大的喜悦(如新生命的诞生),母性是女性快乐的一个源泉,只是人类进入父权社会之后,女性才受到压迫。

克里斯特瓦认为母性身体作为起源的意义先于意指本身。母性欲驱构成的原初过程一概被语言压制。克里斯特瓦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提出“卑贱”一词,她认为“这是一种强烈的厌恶、排斥之感,好像看到腐烂物要呕吐,而这种厌恶感是身体的反应,也是秩序的象征,使人强烈排斥、抗拒对主体的威胁。这种抗拒始于主体对于母体的抗拒,若不开离母体,主体永远不会发生”(Guberman 1996: 118)。正如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由于新陈代谢被排出体外,我们在卑贱化过程中不断更新自我,此过程永无休止。卑贱存在于“象征”秩序之外,指处于前俄狄浦斯阶段中的母性空间里的母子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的机制。对母亲的排斥是一个创造、建构自我的必要过程,微观层面上的主体语言表达能力就是一例。因为隐藏在欲望之下,卑贱同时与恐惧、享乐相连:恐惧来自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消失;享乐是活跃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符号”意指“非逻辑、想象、音乐、舞蹈和戏剧”的表达,满足母性完整的存在。克里斯特瓦把卑贱的审美经验与诗歌的宣泄性联系成“一种不纯的过程,这一

过程带来的保护只有通过沉浸于卑贱之中才能得到”(Kristeva 1982: 67)。这种不确定性正是诗性语言分裂性的本能时刻,具有意指能力的主体在此时发生崩解。靠近潜意识的母性卑贱冲破意识的包围,回到未被割裂、未被异化、原初浑然一体的母性身体的本真状态。同时,作为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体系的另一面,卑贱不仅不威胁“象征”秩序,还以各种净化方式靠近升华,归结为绝佳的陶冶方式——语言、艺术。总之,母体可以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倡导者,母体以“符号”的形式成为前俄狄浦斯空间的主宰力量。

女权运动呼吁全社会认识到女性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力。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西方哲学把男性与主动性、灵魂相联,把女性与被动性、身体相联。“母亲”、“物质”和“子宫”在词源学上相通。身体与物质被定义为暂时的、懒惰的、幻觉的,而由于与生俱来的被动性的“女性身体是一个死亡的容器……她的身体为诱惑而生”(Griffin 1978: 83)。与思维相对立的身体,尤其是成年女性的身体与卑贱密切相关。克里斯特瓦的女性主义身体理论关注处于“卑贱”、“升华”以及“净化”中蕴涵在母性身体内的真实体验、感受(包括压抑的、恐惧的、欲望的)和情感,把它作为一种符号化的话语纳入到整个话语体系中。她发展一种肯定性的女性身体符号学,“女人的性是流动的、非线性的、非理性的和反逻辑的”(Irigaray 1997: 252)。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抽象主体不同,这种有性别的身體呈现出生命性、具体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女性借用身体话语从边缘位置向意识话语的中心位置发起冲击。“躯体”具有流动性,既是一元又是多元,从而避免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身体”趋向于生动、具体的“多重的身体”,每一个身体都有各自的特点、能力和欲望。如果女性没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就失去主体性。所以,主体性与身体的特殊性相联系。例如,土库曼女性居住的帐篷呈圆形,女性在其中繁育后代、料理家务,圆形穹顶像天空、像子宫,象征着与自然的连接、生活的富裕和快乐。列斐伏尔强调空间规划中身体感官的全方位体验:空间遵循自然的生长、斗争的规律,与人类的生存繁衍直接相关。身体与社会空间有同构关系,身体能量的释放成为空间解放的重要目标。列斐伏尔将这个被解放的空间称为“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差异”意为身体对这个理想空间的“占有”(appropriation)。身体对空间的占有,“是恢复视觉之外的感觉,以及性的感官——不是孤立意义上的性,而是在性能量的意义上,它导致按照某种特殊节奏的释放和流动”(Lefebvre 1991: 363)。

克里斯特瓦的“符号”源于能值和所指之间的互动关系,流动于主流话语形式的边缘,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原始冲动、婴儿在与母亲的亲密接触中最初的身体欲驱相

联系。她又借用柏拉图的“子宫间”(chora)解释符号欲驱的来源。“子宫间”可以感知,但无法用语言定义,作为孕育新生命的母体空间而存在。主体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具有来自肛门和口腔的冲动,由此产生一种节奏,并为真正语言的产生准备条件。一言以蔽之,主体以颇具颠覆色彩的“符号”形式在前俄狄浦斯空间即母性空间内自由嬉戏、释放能量,获得主体性及开放流动性。

身体因为蕴含着流动的能量,它与空间的关系以此为媒介。“掌握着能量的身体/生命体,创造或生产自己的空间;反过来,空间法则,即在空间中发生区分的法则,也控制着生命体对其能量的施展。”(Lefebvre 1991: 170)身体使用能量遵循的“耗费原则”符合身体生命活动的需要,不用于仅为维持生存而最低限度地使用能量。“生命活动”包含游戏、艺术等活动体现人性的本真需求,而生存原则这种现代社会用理性方式规划空间的原则只能导致对身体的压制。列斐伏尔倡导的“差异空间”恰恰是不符合资本主义逻辑的空间。传统空间哲学推崇形而上的理念使空间阐释中的“空间与伦理”、“空间与感觉”等极具价值的问题被无形地忽视。空间研究应关切空间与个体生活、伦理反思及感觉等维度的命题。在克里斯特瓦看来,怀孕、生子使女人备受主体分裂的痛苦,但也使其获得爱的体验,女性的平和、爱心等特征对应人文关怀的部分,这种人文关怀也是空间伦理追求的终极目标。克里斯特瓦进而认为,伦理问题还存在于女性同他人的关系中,即女性更易包容他人;母体除具有生物学本能,还是一种延续生命的征服力量。母体的包容性与空间的流动性形成对应关系,后者被“空灵”这一现代空间概念加以表述,现代空间使每个人在其中处于相对的中心和边缘,“空灵”的不确定性破坏结构和权力,将属于女性的灵动空间还给女性,空间亦成为开放性的领域。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旨在回归身心合一基础上的具有“活动力和能动作用的流动性和社会空间”的身体,充分挖掘人的多元异质性。(Grosz 1994: 19)克里斯特瓦在此阶段著作中的核心观念是:每个组织都应最大限度地维护每个成员的特质,实现人性的复归,形成多元、博爱的新世界。

5 结束语

从关注空间基本内涵的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将空间作为客体认识对象的近代认识论哲学到20世纪末期的“空间转向”,空间一直被赋予复杂的含义。现代空间理论的开拓研究是在后现代思潮批判理性主义的二元思维的过程中进行,本身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第三空间”的概念包容一切,它既可知又不可知,既具体又抽象,不仅突破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还增加空间的多样性。“空间不再仅仅是时间与运动的参照物,而是与历史、文化、政治、种族、性别、权力、心理,甚至时间等多种

因素紧紧地纠缠于一体。”(方英 2013:103)

正如空间研究渗透到多领域、多层次,克里斯特瓦的思想也具有跨学科性质,涉及哲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社会学、文学和女性主义思想多领域,尤其是她的精神分析研究是以解析符号学为支点向整个人文学科辐射。在空间的多维意义中,其理论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心理意义和身体意义尤为重要。她创设的“符号空间”研究世界的组成与人类的关系,基于时间、空间和语言的相互关系。这种把世界形成与语言诞生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具体反映,而存在主义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声也主张差异多元性。

朱莉娅·克里斯特瓦的这些创新性跨学科理念穿越不同理论边际,凸显其理论的包容性,契合后现代主义多元共生的基调。它们蕴含的多层涵义由后现代主义多元性决定,各理论的研究范围被拓宽并形成跨学科视野。她倡导真理多元化的跨界理论体系不仅结合空间研究这个当代新兴学科,也赋予该学科后现代文艺思潮的一系列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产生持续影响。

参考文献

- 包亚明. 后现代与地理学政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包亚明. 现代性与都市文化[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 陈嘉映. 西方大观念[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 方英. 理解空间: 文学空间叙事研究的前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拉曼·塞尔登. 文学批评理论: 从柏拉图到现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罗素. 西方哲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Casey, E. S. *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Elden, 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M]. London: Continuum, 2004.
- Griffin, S. *Wome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Grosz, E.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Guberman, R. In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A]. In: Baruch, G., Hoffman, E. (Eds.),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Irigaray, L. The Sex Which Is Not One [A]. In: Conboy, K. (Ed.), *Writing On the Body: Female Embodiment and Feminist Theory*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risteva, J.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Kristeva, J.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Kristeva, J. *La Revolution du Language Poetique* [M]. La Haye: Mouton, 1984a.
- Kristeva, J.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b.
- Kristeva, J.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A]. In: Selden, R. (Ed.),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A Reader* [C]. London: Longman, 1988a.
- Kristeva, J.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A]. In: Selden, R. (Ed.),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A Reader* [C]. London: Longman, 1988b.
-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 Lefebvre, H.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 Stengel, W. B. *The Shape of Art in the Short Stories of Donald Barthelme*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Young, I. M.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M].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定稿日期: 2016-04-21

【责任编辑 孙颖】